

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国化的传统思想资源

汪建华

(中南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 长沙 410083)

摘要: 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和近代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 这些思想从本体论上来说是在“天人合一”观的基础之上; 从方法论上来说表现为“内圣外王”的人的发展模式; 同时, 这些理论又具有明显的道德主义色彩。这些传统人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国化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资源、理论构成模式和直接的思想动力。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中国传统思想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中国化, 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而且也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汲取了理论养料。恩格斯在谈到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贡献时指出: “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 是不能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 就是说, 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 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1] 与黑格尔哲学对德意志民族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样, 中国传统人学思想对于现代中国人的人学思想的形成也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中国传统的人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这是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国化进程的时候应该充分注意的。

—

在论及中国传统人学思想资源时, 我们首先应该明确, 中国传统思想不仅仅是儒家学说, 儒家学说只是中国传统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儒家学派没有形成前, 中国传统思想已经有着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 并且进行了许多与人的发展有关的思考; 在儒家学派形成后,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它也只是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个学派; 即使从汉代开始“独尊儒术”, 其他思想流派也没有中断其发展, 儒家思想还从其他思想流派中吸取了大量思想养料。但是, 我们也不能不指出, 儒家思想毕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 就其对现代思想的影响, 特别是对现代人的发展理论的影响来说, 远远超过了其他思想流派; 而且, 正因为儒家学说在其发展过程中吸取了其他流派的大量思想养料, 在原始儒学之后

的儒家思想实际上越来越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综合体。人们在探索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影响时, 往往是以综合了其他各家学说的儒家思想作为样本。

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说过: “如果比附西方哲学的分类, 儒家‘探索如何作人的道理’, 应说是一种以人格发展为运思核心的人学。”^[2] 从其核心内容来看, 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最重要的内容特征之一就是特别关注“人”的问题, 将其称之为“人学”是恰如其分的; 从理论旨趣上来说, 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可谓博大精深, 它可以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传统文化资源; 在特定意义上, 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涉及到许多人的发展问题。比如, 在天道与人道之间, 更偏重于人道的思索; 除个别思想流派外, 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学非常强调入世, 讲究人的内在超越, 其致思对象不离人伦日用, 关注现实人的现实生存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人的修养, 儒学中“仁”的核心就是“修己安人”。这一核心同时包含两大“基本点”: 一是为人之道, 二是为政之道, 为政之道又可以还原为待人处事之道。在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学系统中, 蕴含着丰富的与人的全面发展直接相关的“成人”理念。尽管中国传统思想缺乏有关系统化理论, 但上述不同层面的人学思想,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另外, 我们还必须说明, 中国近代关于人的发展的思考出现了许多具有当时时代特征的理论形态, 如“人心风俗”思想、“改造国民性”思想、“新民”思想等。这些理论形态之所以说是具有当时的时代特征, 就是因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它们中的大部分已经不再属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范畴。但是, 这些思想体系或者理论形态无论怎样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 都没

*收稿日期: 2008-09-19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 立项资助 (06B01)

作者简介: 汪建华, 女, 湖南长沙人,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学。

有能够完全逸出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范围。更具有直接意义的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传入后的现代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而言,近代的“人心风俗”思想、“改造国民性”思想和“新民”思想等都还是属于传统的范畴。因此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国化的传统思想资源时,我们也必须把中国近代的这些思想或思潮包括在内。

二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关于人的发展问题的思考具有的某些特征,对现当代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的发展理论建立在“天人合一”观的基础之上。“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根本精神之所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究天人之际”,其基本理念就体现在“天人合一”这一命题之中。在中国远古的神话时代,人们就已经从人神关系的角度认识“天”,尽管“天”的本质是多元的,但“天”对人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一点却是明确的。周初出现的“天命靡常”的命题说明了在天人关系中天的地位的下降,人的地位的上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从天人关系角度来认识人的本质这一本体论基础的缺失,恰恰相反,春秋以后的各个学派都是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人的本质。儒家强调“天”的道德意义,认为人的最高道德境界是遵循天的秩序与和谐。孟子认为,人在自身的品性上与天是统一的,是完善自足的,即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只不过人未能发明自性。因此,人应该不断地进行自我道德反省,扩充本性,即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3]这样,“天道”和“人道”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正是人生最终极的精神追求。到了西汉,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天人感应论”,将“天人合一”发展为一种神学世界观,完全扼杀了先秦天人关系理论中的人文精神。而老庄学派则更多是从强调“天”的自然属性的角度来论述天人关系。他们认为天和人都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的“天人合一”就是强调人和天(自然)一样,只能按照其自由本性来发展,而不能把天与人看成是对立的。因此,庄子提出:“天与人不相胜也,是谓之真人”。^[4]这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基本命题,这对人们认识自身的价值和发展问题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从天与人的和谐统一出发,人们把自身作为自然的有主观能动性的一部分,人的发展也就是顺应规律的发展,这种人的发展观特别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发展;另一方面,从“天人感应”的观念出发,把人作为完全受“天”支配的被动对象,而“天”对人的主宰又是通过特定的中介(君主)实现的,于是,人只能听从君主的统治,人的发展自然也只能被限制在“三纲五常”的伦理框架范围了。恰恰就是后一点,导致中国封建社会不可能实现人的真正自由的发展;同时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人的自由发展的理论;这也决定着马克思主义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必然受到这种“天人合一”观影响,而显得曲折而艰难。

第二,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人的发展的理想模式是“内圣外王”。“内圣外王”并非只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其实道家和其他学派也在不同程度上主张“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道路。当然,儒家的“内圣外王”观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典型的一种理想人格。按照儒家的理解,圣是一种自觉履行道德规范的人格典范,也是一种个体自我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而“内圣”则是指这种道德人格典范和道德修养境界的修炼。而“外王”则是指一种政治人格,是指在内在的道德人格的基础上,把圣人的王道理想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中体现出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圣王理想。在传统的儒家思想看来,“内圣”所追求的是一种完全与“天道”吻合的“圣”、“诚”,也就是“天之所命”在主体身上的完全体现。然而,仅仅是将“天之所命”内化为主体的自觉要求还远远不是“内圣”,因为“内圣”的更高境界还在于将自身内在要求的“天之所命”推及至人,以“周乎万物,道及天下”,即通过“外王”的事功来显现。因此,“圣”的目的是为了“王”,道德修养归根结底要落实于政治上的事功。“外王”虽表现为以政治权力为前提的“治国平天下”的才能和事功,但“外王”的事功必须以“内圣”为基础。“外王”的“治国平天下”不能“以力服人”,而必须“以德行仁”。这就要求“外王”须以“内圣”道德人格的力量来掌握政治权力,建立政治权威。而且,“外王”的“治国平天下”最终是要实现人类道德高度完善的“有道之世”,这种“有道之世”只有靠“有道之君”才能实现,这种“有道之君”当然就是合乎“内圣”要求的“外王”了。这种“内圣”与“外王”的相互规定,就在理论上把二者结合起来,从而也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发展提供了一种理想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在实践上是无法实现的。

中国传统思想所提供的这种人的自我发展的模式对于人的发展来说也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内圣外王”所寓含的“入世”精神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动力和实践依据,从而使人们看到,人的发展不只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自我修养,还包括现实需求和能力的培养,而这些只能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内圣外王”的发展模式决定着人的发展单向性,在“内圣外王”模式的规范下,人的发展方向的丰富性被扼杀,人们的发展归宿只能是一种政治化的“伦理人”或是伦理化的“政治人”。正是这一特征导致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的发展理论过于伦理化,而缺乏足够的人文意义。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国化过程中也特别要注意克服这种单向性。

第三,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的发展理论具有鲜明的道德主义色彩。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命题和“内圣外王”的模式,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规定着中国传统思想支配下的人的发展,首先指的是人的道德的发展。虽然“天人合一”的命题可以从多方面进行阐发,但占统治地位的解释是以西周的“以德配天”为蓝本。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只能按照“天”安排的秩序发展自己。于是,从体现“天

德”的“礼”和“仁”到由“天道”决定的三纲五常就成为制约人们行为的伦理型政治规范。而“内圣外王”的发展模式首先强调的是人的内在的道德修养;然后在这种内在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实现人的政治事功,这种政治事功的实现除了必须以内在的道德修养为依据外,还必须“以德行仁”,即符合“天命”的道德要求。于是,在传统思想家论述人的本质和价值时首先是考虑人的道德本质和道德价值,而人的发展的各种要素,如需求、能力、个性等都只能在人的道德本质和道德价值的范围内来考虑。这就决定着中国传统思想中所允许的人的发展只可能是一种有限的和片面的发展,而不可能是自由的和全面的发展。这种道德主义的倾向在近代中国也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形式。比如鸦片战争后兴起的改革“人心风俗”的思想、戊戌到辛亥期间的“新民”思想和新文化运动中的“国民性改造”思潮无一不打上了传统道德主义的痕迹,这当然也影响到这些思想中所包含的人的发展理论也具有道德主义的色彩。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国化过程中不可避免而又在逐步克服的一种理论偏向。

三

现当代中国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把“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的具体国情既包括现实的国情,也包括历史的国情;既包括物质的国情,也包括精神的国情;中国传统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作为中国国情的一部分,必然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国传统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给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国化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任何一种外来思想要想对一个民族的思想 and 实践产生影响,首先必须要适应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行为特征。中国人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的形成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长期熏陶和影响的结果。虽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这种发展和变化并不会根本改变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恰恰相反,正是有这种发展变化,才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不断地加强和完备。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和人的发展的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中国人的人生智慧,从而也融汇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之中。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的人生智慧是德性的智慧,礼乐教化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功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老子、庄子的人生智慧是空灵的智慧,逍遥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然,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和。佛教的人生智慧是解脱的智慧,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空掉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儒释道三教的哲学,充满了普遍和谐、圆融无碍之智慧,在今天仍有其价值与意义。”^[5]当我们今天思考有中国特色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体系时,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人生智慧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思想和文化资源。

同样,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构成模式也对中国现当代意识中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一种重要的思维基础和理论构建模式。在这种思维基础上,人们总是把自身作为自然的有主观能动性的一部分,人的发展也就是顺应自然规律的发展。正是从这种“天人合一”观出发,形成了一种强调和谐统一的发展观。我们党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尽管与传统的“天人合一”观有很大的差别,但毋庸置疑的是,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显然在“天人合一”的理论模式中吸取了一些思想因素。再如“内圣外王”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修养的一种理想模式对中国传统的人的发展理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形成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型的人格模式。而这一人格模式也成为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这种人格模式为中国知识分子设计的人生道路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实际上也是这样一种人生价值的追求者。唯其如此,才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了心理认同的思想基础。正是这种修、齐、治、平的人格理想使“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普遍具有济世救民的慈悲情怀。也正是从济世救民的慈悲情怀出发,他们在众多的外来思想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正如恽代英指出的:“吾等信新学说非以纯理的脑筋信纯理的学说,乃以此学说有利于大多数人也。”^[6]同时,这种“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也一度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构建其人的发展模式时的一种重要思想资源。“内圣外王”强调将人的内在道德修养转化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事功;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也强调道德品质必须通过政治品质表现出来,把道德修养与政治立场直接等同起来。这不能不说有“内圣外王”人格模式的影响。

另外,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并将其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从近代启蒙运动中获取了思想动力和理论养料。其中新文化运动中启蒙思想家对国民性问题的探索,就包含着对理想国民人格的设想。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曾有过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经历。在向共产主义者转变前,他们几乎都探讨过国民性问题。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都曾经为“改造国民性”、“革新道德”和“新民”而呐喊,并且在论述他们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时对人的发展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尽管近代改造国民性的思潮是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继续为重塑国民人格而进行探索。尽管他们已经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但这一转变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可能交织在一起,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将他们的思想截然地分为资产阶级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两部分。因此,近代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对他们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在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也不排除 (下转第 89 页)

失业者。这些无业或生活陷入困境者都是犯罪团伙的主要来源,但是受其出身影响,其作案手段也各有特色,这就是同为犯罪团伙,但是十大恶、摩登破坏团及玫瑰党作案手段各异的重要原因。不仅经济上的失衡会成为城市中犯罪团伙涌现的缘起,特定条件下文化观念的冲突也会导致类似情况的发生。如天津摩登破坏团之活动,即是天津市内守旧派人士对那些“好赶时髦”的同乡的侵犯。由文化观念而引起的犯罪活动使得天津的犯罪团伙与其他大城市相比,在存在共性的同时,又有了一定的天津特色。

参考文献:

[1]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津简史[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

[2] 杨志垣, 等. 我们的家园·天津[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8 28

[3]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 天津通志·附志·租界[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4] 储仁逊. 城市史研究[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112

[5] 林 希. 天津人[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6] 周俊旗. 民国天津社会史[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284

[7] 曹莉萍. 天津商人与清末民初社会习俗变迁[J]. 社会科学辑刊, 2004(3).

[8] 公安局侦缉队取缔十大恶[N]. 益世报, 1934- 10- 22 (5).

[9] 特三区 捕获十大恶首领[N]. 益世报, 1930- 05- 31 (10).

[10] 十大恶威吓船员[N]. 益世报, 1929- 03- 22(10).

[11] 假借名义勒索船户[N]. 益世报, 1929- 09- 03(11).

[12] 十大恶暴行之一般[N]. 益世报, 1930- 06- 02(10).

[13] 津门发现玫瑰党[N]. 益世报, 1934- 03- 21(5).

[14] 摩登破坏团出现于本市[N]. 益世报, 1934- 04- 06 (5).

[15] 本市发现摩登破坏团后 五项破坏主义[N]. 益世报, 1934- 04- 10(5).

[16] 苏智良, 陈丽菲. 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30

[17] 十大恶仍甚猖獗[N]. 益世报, 1929- 03- 28(11).

(责任编辑: 骆晓会)

(上接第 85 页)

对人的改造,使人不断得到发展。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也有着同样的诉求,只不过他们认为国民性改造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7]在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们对人的发展的思考甚至还带有从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那里接受的很多理论观点和词语。如在 1921 年 8 月毛泽东在长沙创立湖南自修大学时,强调自修大学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同时他宣布自修大学的宗旨是“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因流于社会”;^[8]要求“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9]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与毛泽东在当年组织新民学会时相同的思想,如“适合人性”、“发明真理,造就人才”、“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等,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把人性的改造和发展与社会的改造结合得更加紧密。其实,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始终都关注对国民性和人性的改造,即使在建国后,他思想中改造国民性和人性的痕迹还清晰可见。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23

[2] 杜维明.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445.

[3] 李 贽. 四书评[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275

[4]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70

[5] 郭齐勇. 儒释道的人生智慧[EB/OL]. Confucius2000(21 世纪孔子)[2002- 02- 20] <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rshddrshzh.htm>.

[6] 中央档案馆, 中国革命博物馆,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 恽代英日记[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530

[7] 蒋光慈. 关于革命文学[C]//当代中国文艺论集. 上海: 上海书店(影印本), 1996

[8] 李 锐.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335

[9] 毛泽东.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M]//中国书院史资料: 下册.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2590- 2592

(责任编辑: 卫 华)

(12)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on "A 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WANG Jian-hua(083)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al Scienc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China

Abstract Both Confucianism-based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s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of-a-nation thoughts contain a wealth of ideas on human development which are built ontologically on the "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 theory developed methodologically in an "a-saint-inside-and-a-king-outside" mode and of distinct morality. Th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on human development provide not only indispensabl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for Chinaized Marx's "A 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theory but also a certain mode of thinking, a mode of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a direct ideological impetus.

Key words Chinaized Marxism; "A 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theory;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13) **Repetition and Plagiarism——A Rediscussion on Ben Hua and a Refutation to SONG Fei And PANG Xiu-hui's Criticism**

CHENG Gu-rong(090)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In literary creation, repeti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positive repetition and negative repetition. Positive repetition is a significant rhetorical device and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a writer to form his writing style. Negative repetition is a meaningless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and an inferior way of cultural mass production in industrial age. The repetition of the rural experience in Hebei, the customs of the people there and their simple esthetic style in TIE Ning's novel is positive while her plagiarism of the Pile of Cotton in Ben Hua is negative.

Key words TIE Ning; Ben Hua; Pile of Cotton; repetition

(14) **On Economic History-Economics Relationship**

YIM Jian-yang(107)

School of Economic Manage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As a basic course, Economic Histor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economic discipline. However, many economists do not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even belittle its value and function in economics, which will not be in the interest of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s. Hence the necessity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 Economic History is the source of Economics while Economics theories provide methodology for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Key words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s; source; methodology

(15) **Analysis of Hindrances to "Pan-Chang-Zhu-Tan" Regional Tourism Cooper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YAN Yong-hong; TIAN Ding-xiang; WANG Zhao-hui(110)

School of Economic Manage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Industr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Pan-Chang-Zhu-Tan regional tourism cooperation will not only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Hunan but also boos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form experimental areas—a resource-sa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 in Chang-Zhu-Tan city group.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hindrances to the regional tourism cooperation in the area and puts forwards some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Pan-Chang-Zhu-Tan"; regional tourism cooperation; the hindrance factors; countermeasures